另一种高原跋涉

○ 党益民

我是高原老兵，业余作家。十九岁当兵踏上青藏高原，中间曾调往新疆等地工作，后来重返西藏，直到几年前退休回到内地。二十一岁那年，我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上的野营帐篷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戍边几十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过十多本书。后因工作繁忙、高寒缺氧、睡眠不好等原因，不敢夜里加班，便停止了写作。

搁笔十年，重新拾起，因为我离开了雪域高原，不再奔波忙碌，有种不得不写的强烈冲动。回到氧气充足的内地，想起高原边关，想起戍边战友，心里便生出一丝愧疚，好像自己是个逃兵，尽管我已到了该解甲归田的最高服役年限。离开高原后，我急切地在次高原找到一处偏僻之地，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曾经考虑过好几个书名，最终定为“天牧”。

这次写作是另一种高原跋涉，是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跋涉。我不敢轻易落笔，担心对不起戍边战友，惊扰雪山上的英灵。我感觉自己还在高原，还在熟悉的军营，该出操时起床锻炼，该熄灯时卧床休息，生活平淡而有规律，但我的内心却经历着一场场高原狂雪，我的灵魂一直行走在雪原，接受着阳光的曝晒与检阅。我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又感觉身边站满了昔日的战友。有时早上醒来，我仿佛能隐约听见从遥远的雪山传来的军号声。创作之路坎坷而漫长，比跋涉在雪线之上还要艰难，但我不敢懈怠，日复一日地写着，输入电脑里的每个字都击打着我的灵魂。我好像在躲避着什么，又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呢？

回望高原，怀想四十二年的军旅人生、戍边岁月的平凡与不凡，想起那些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我常常会悄然落泪。在高原这么多年，我不曾落泪，为何离开了高原却变得如此脆弱？

当兵之初，我们部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修筑青藏公路，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土豆炖白菜、盐水煮黄豆，最好吃的是炸酱肉丁和雪菜罐头。唐古拉山冰封雪裹，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晚上睡在帐篷里，穿着绒衣绒裤，盖两床被子，有时还得加盖一件皮大衣。早晨醒来，大头鞋冻在地上，用力摇晃几下才能拔起来。高寒缺氧，走路都气喘，更别说干重体力活了。有的战友因缺氧或其他高原疾病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也晕倒过，但很幸运，又醒了过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同年入伍的战友早上还在和我说话聊天，下午驾车去执行任务，连人带车翻入江中。我们当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后来才在下游距离几十公里的河滩上找到半具，掩埋了他；过了几个月，又在更下游的地方，找到了另外半具，又掩埋了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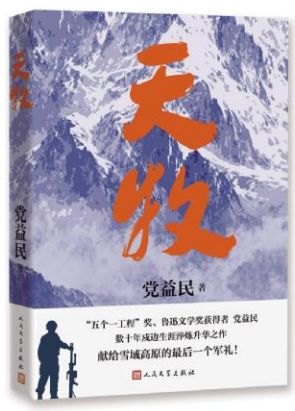
有一年暑假，一位年轻的军嫂带着孩子上高原探亲，一家三口刚刚团聚，身为连队干部的丈夫便受命带队去执行任务，妻子和孩子在营区等他回来，可是等来的却是他途中牺牲的噩耗。

有一位年轻的排长，在一次塌方中被砸碎了五脏六腑，当时我在场，也几乎被砸中。我参与了抢救的全过程。当时县医院停电，我们手举蜡烛，给医生照亮，蜡油流在手上全然不知。我看见他的血从身体的不同部位涌出来，渗透薄薄的褥子，滴落在床下的脸盆里；我看见他急促地喘息着，一口一口吞噬掉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想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戍边故事，告诉雪域之外的人们，以此告慰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

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县市，在履行戍边使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有一年，我在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齐山下的一个连队蹲点，那里海拔将近五千米。我了解到几个新兵惧怕高原，思想很不稳定，我便对他们说：“你们才十八九岁，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去绕冈仁波齐徒步走一圈，以此证明高原并不可怕。”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名军官出发了。我们身着迷彩服，挎包里面装着一棵小白菜、两罐牛奶、四根火腿肠、五个花卷，还有应急手电，另一边挎一个军用水壶。绕行冈仁波齐一圈，需要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徒步行走五六十公里。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徒步行走，相当于身上始终背着一袋面粉，途中还会遭遇雨雪和冰雹的袭击。当地老百姓转一圈需要两三天，可我们那天仅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就走完了全程。走到黄昏时分，我已精疲力竭，身子开始摇晃，双腿麻木机械地朝前迈。最后一段要在悬崖峭壁上穿行，当时天很黑，很冷，应急手电没电了，我们只能凭着微弱的月光辨别崎岖的山路。后来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跤，几乎摔下悬崖，差点丢了性命。夜里十一点多，我们终于走出了山谷，看见晃动着手电迎接我们的战友。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行走，但这只是我遭遇过的七次劫难中的一次。

在高原服役期间，我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带领部队拉练演习、执行任务。我热衷于研究特战，研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专业资料，也喜欢去特战队员们的训练场地，有时会跟他们比比枪法。有一次，我用“高清狙”射击两百米外的胸靶，五发子弹，只打出三个弹孔——后面两发子弹擦边打进了前面的弹孔里，将那两个弹孔扩成了椭圆形。我们的狙击手里有男兵，也有女兵，其中一名是从牧区入伍的藏族女兵，他们都成为《天牧》里人物的原型。



我认识一位边防部队的老兵，他退伍后重返高原，与当地政府联合创办了牦牛合作社，带领当地牧民发家致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科学饲养牦牛的方法，了解到许多高原牧业振兴的真实信息和合作社的运作方式。《天牧》里男主人公余木的形象，有一部分来源于他，当然也融合了其他狙击手和特战队员的经历。

我还认识一位林草局的副局长，他以前也当过兵。周末休息时，我便抽空去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查阅有关牦牛饲养和牧业发展方面的资料。《天牧》中对牦牛、雪豹、雪狼、旱獭、鼠兔等高原动物以及十几种牧草的描述，不是我虚构臆造，都有科学依据。

我还结交了许多藏族朋友。每次路过牧场，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拐进牧场去看一看。我走进牧民的帐篷或低矮的藏式土坯房里，喝上几杯酥油茶，跟牧民朋友拉拉家常。牧民朋友都很纯朴热情，见到我们很高兴，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也像走亲戚一样，将车上带的干粮罐头送给他们。我不抽烟，但我会专门带上烟，拿出来请牧民朋友抽。《天牧》里对牧区生活的描述，就来源于我多年的观察积累。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转业留在西藏或退役后又重返西藏的战友，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强边”政策，有些当了边远乡镇的基层干部，有些当了小镇警察，有些留在当地开饭馆、做生意。他们基本都加入了预备役部队。这些战友，也成为《天牧》中一部分人物的原型。

这些故事和人物，在我脑海里转悠了多年。我如何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我认识到，新时代军事文学，必须从单纯诉苦式写作向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转变，从书写传统战争向描述新型战争转换，从旧有创作模式向聚焦新军事革命跃升；把戍边叙事融入科技强军、民族复兴、大国博弈的时代大背景，直面戍边军人的使命担当、个体成长与家庭困境等深层次矛盾；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主义、先锋笔法、心理叙事等新型表现形式，强化军事文学的时代感和文学性。总之，我想让这部小说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内缩走向外扩，从边地走向大众。

名家点评

党益民在高原戍边几十年，是新时代强军伟业的见证者和实践者。其创作素材多撷取自雪域高原戍边将士与边疆各族群众的奋斗日常，行文质朴沉厚、情致恳切赤诚，在思想深度与通俗可读性之间达成精妙平衡。他依托边疆积攒的鲜活阅历与扎实文字功底，将高原大地的故事带入大众视野，形成不可复制的“戍边文学”创作现象。

——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

党益民的作品丰博厚重、元气充盈、精神饱满，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血脉偾张。他的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雪山与边地，不仅仅是简单书写军人的生活、军营的故事，还以完整立体的叙述完成生命图景的整体呈现，具有宽阔深邃、直击人心的鲜明特色，这种“在场”写作的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陈彦（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

党益民的作品来源于真实经历、长期体验和生死考验。他的书写别人无法复制，自然也难以逾越。他对国家战略和边防守卫等方面的见解和实践，更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所以说，党益民和他的文学创作成果，是当下军事文学新高度的独特标记。

——李炳银（著名文学评论家）

《天牧》是一部有深度的叙事作品。作者将几条线索巧妙地整合到一起，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既对社会复杂性真实呈现，也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作品借助边境、边防和国家安全等叙事环境的营造，使得小说具有了绵长的历史深度。作品具有独特的内在气质，是作者对四十余年戍边岁月的一次内心烛照和精神检阅。

——周景雷（辽宁省作家协会原主席）

在《天牧》中，党益民不满足于记录一个已经“完成”的边疆形象，而是以深沉、犀利的目光，凝视着一处处多元杂糅、尚未定型的生活现场，耐心细致地剖析改革强军大背景下个体军人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益民在小说中不回避时代转型的矛盾，不遮蔽个体生存的困惑，不美化戍边生活的复杂，以“当代性”视域审视传统戍边文学的局限，以期让军旅文学与当下读者共情、共鸣，进而参与到新时代思想精神的建构中去。

——傅逸尘（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

《天牧》的主人公余木所具备的英雄人格，并非脱离尘世的神性光辉，而是扎根高原热土、融入平凡日常的质朴坚守。他放下钢枪、握住牧鞭，将戍边时期淬炼而成的忠诚、坚韧与担当，转化为放牧过程中的恪尽职守、面对生活波折时的从容坚韧，以及对待邻里的热忱仗义。他的“自牧”，既是对自我内心的沉淀与校准，也是对英雄本色的守护与传承，使英雄人格不再是高悬的榜样符号，而是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姿态，让英雄的精神得以在边地高原继续传承。

——王敏（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党益民的长篇小说《天牧》，混合了多种叙事元素，让读者感到了温暖、混茫、奇异、幽深、野性，是多元素构成的那种丰富复杂的审美叙事。作品里氤氲着一种气息，既是以余木为主人公的军旅生活里生长出来的豪情、大义与理想，又有着吴丽构成的间谍与个人多舛命运相交织的迷雾，这些要素展开在藏族牧民生活与其习俗文化背景上，还有“天牧合作社”牦牛的发展与牧民们的各种问题等，几层要素叠加，构成一部极为好看又极具当代审美情怀的好小说。

——仵埂（西安培华学院文学院教授）

悦读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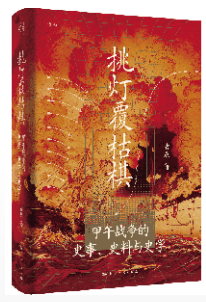
2026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责编：赵命可 美编：刘雯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艺術報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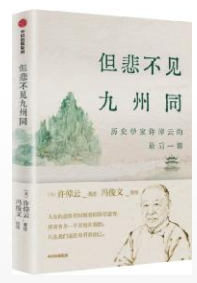
《挑灯覆枯棋：甲午战争的史事、史料与史学》



作者：吉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定价：78.00元

清初诗人查慎行“挑灯翻史传，浑似覆枯棋”之句，点明读史犹如复盘棋局；晚清名臣陈宝琛“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的隐喻，道尽甲午战败的惨痛。本书围绕甲午战争这一议题展开追问：清政府为何输掉了甲午战争？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及补篇。上卷立足具体“史事”，对甲午战争的关键史实与细节逐一考证辨析；中卷聚焦原始“史料”，以中日多家机构所藏的珍稀未刊文献为研究核心；下卷着眼“史学”，收录相关研究综述与书评，系统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发展脉络。书末附有一篇作者早年的未刊文章，依据史料虚构一名北洋海军水兵的经历，寄托了纯粹质朴的治学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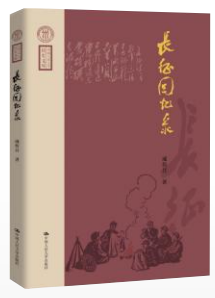
《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



作者：许倬云著述、冯俊文整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定价：58.00元

“我这一生，自觉很圆满。若说有什么遗憾，大概就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95岁的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人生遗憾，也透露出他对家国、祖国人民深切的情感。这本书以许先生自喻为“三峡岩石”为精神线索，展现了他的人生感悟、学术思考与文化关怀，以及他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本位与尊严的生命品格。许先生提出“知道自己‘是个人’”是人生最大的事情，主张通过“忠”“恕”“仁”的修养追求正面人生。这本书也记录了许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对年轻人的关怀、对家国的牵挂、对读者最后的深切嘱托：在惊涛骇浪中，扎实自己，不要慌张，不要放弃；自己站得住脚跟，不倒下，不退后，不停止；时时刻刻地改良、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偏差；要求自己，安顿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

《长征回忆录》



作者：成仿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0月
定价：49.00元

《长征回忆录》作者成仿吾以大学教授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参与了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他以真实生动的文笔再现了长征全过程和所有重大事件，文字悲中寓壮、苦中有乐，生动地体现了红军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成为党史界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经典书目。在中国革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两人亲身经历了长征；而作为大学教授，只有成仿吾一人独自体验了长征的艰辛与磨炼。